

以傳統文化為鑰開啟生命教育 抵禦現代困境

●蔡崇達相信，在孤獨漫長的時光裏，這世界總會以某種方式陪伴你，和你交朋友。

從探尋個人命運的《皮囊》，到追問生命意義的《命運》，再到記錄小人物百態的《草民》，作家蔡崇達始終在挖掘人的來處與根系。如今，他在首部童書《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中，將創作的根鬚探向當下最緊迫的議題——在一個精神容易「懸空」的時代，我們該如何為下一代，乃至為我們自己，重建源自生命與傳統文化深處的精神防禦力量。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蔡崇達：我們要學會和世界交朋友



▲蔡崇達新書《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三聯書店（香港）供图



蔡崇達的創作養分，來自這片土地上生活過的「億萬萬個先人」，正如他所說：「這塊土地一直在開口說話，說的都是如何生下來、活下去的話。」而我們的文化，就是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億萬先人所留存的所有生命經驗，當現代人感到孤立無援，其實可以通過與這浩瀚生命經驗的連接來消解，所以「故鄉」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地理名詞，更是「一個方向，一個重新發現和理解自己的方法論」。而在經歷「故鄉三部曲」的漫長探索後，蔡崇達的視線投向了更迫切的當代困境——生命教育的缺失。

藉童書築造精神根基

《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講述閩南小鎮裏，童年黑狗達與6隻小動物的成長陪伴故事，交織阿太、爸爸媽媽以及鄉親鄰里的瑣碎溫暖。這本書不僅寫給孩子，也寫給大朋友，探討生命的堅韌、陪伴與離別的意義，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生命教育存在着一個豐富而有力的框架——天人合一，其實中國人是很擅長跟世界萬物進行連接的，用這本書的說法，是很擅長跟世界交朋友的。」蔡崇達認為，如果將人生局限在狹小的自我體驗裏，人便容易聚焦於當下的缺失與未來的無常，從而滋生孤獨與焦慮。但倘若一個生命體學會了與世界的所有生命「產生內心的相互映照、陪伴與支撐」，孤獨感便會大幅消減，也就為自己構建了一個廣闊而堅韌的精神支持網絡。

他亦分享了創作童書的深層思考，指出童書並非文學「入門文體」，而是「文學的最高形式之一」：「我認為，好的作家都應該嘗試寫好童書。前幾年我不是不想寫，而是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好到可以寫童書了。」在他看來，童書與寓言相似，承載着文學的本質使命。「寓言通過口耳相傳，讓不識字的人也能感知人性、理解世界。而童書正是守在人心最初生長的地方——它必須使用最簡單、最透亮的表達方式。」用簡單文字表達人性根源性問題，恰是童書創作的難度所在。

談及創作的直接推動力，他表示與兩位女兒的成長密切相關，他觀察到，當下社會經濟震盪導致家庭焦慮層層傳遞，兒童過早被灌輸社會性知識，卻缺乏根本的生命教育。「我們急於讓孩子學習，卻忘了教他們如何面對生老病死、如何與陌生的情感和慾望共處。這本書雖然是童書，但第一句話就是講死亡。」他指出，當前青少年精神壓力大，正是因為過度強調知識填充，忽略內心秩序建設。為此，他不僅自己創



●蔡崇達在講座後為讀者簽書。

作童書，更呼籲作家群體積極以創作介入生命教育領域。「在劇烈動盪的時代，我們更需要加固內心根基——如同颱風來臨時，必須加固樹苗的根部。」他期盼以「回歸根部」的寫作，為下一代構築精神防禦的力量。

文化歸根 新枝繁茂

在「故鄉三部曲」中，蔡崇達試圖探討人與故鄉、命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提醒人們抓住自己的根系和來處，如此才有力量抵禦風雨。如今，他的觀察已從個人生命的來處，延伸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脈絡。他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正在新一代年輕人身上，完成一場有趣且有力的回歸。他提到就讀國際學校的女兒和她的同學們，最流行的文化活動竟是「盤佛珠」，且書包上必掛一個小木魚。他笑道：「大女兒甚至會在做功課卡住時，拿出從普陀山求來的木魚敲一敲，唸叨『菩薩保佑我趕緊會做』，這畫面挺賽博朋克的。」

由此他發現，年輕一代對傳統文化的親近，並非來自外部的說教，而是一種發自「DNA裏的文化基因」的呼應。「和我們這一代70、80後相比，他們對傳統文化有更天然的、出於本性的熟悉和喜歡。」他回憶自己成長的年代，社會氛圍是「拚命學習國際經驗」，總有一種向外求索的焦慮。而如今女兒一代，卻在節假日吵鬧着要回到福建老家的小鎮，她嚮往那種不同於城市的「傳統秩序」，亦享受在小鎮的古蹟、古廟間漫步的歸屬感。

文化尋根並非年輕一代的專利，成年人也同樣在向內探尋，向傳統的文化秩序回歸。「你會發現，身邊有愈來愈多的禪修班，也有很多年輕人去寺廟做義工，藉助傳統文化求得內心的某種安定。」他總結道：「現在各地政府對民俗和傳統文化愈來愈重視，老百姓對其也愈來愈喜歡——我覺得這其實是整個國家和民族都在探尋自己的『來處』。這種對根源的探尋，還處於剛剛開始的階段，但人心都已經不自覺地往這個方向走了。」當人們願意回歸本心時，自然能清晰地聽到那來自血脈深處的、熟悉的呼喚。

從書齋走向人群

蔡崇達日前受邀出席「一本讀書會之名家文學季」系列講座，以「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為題開講，與讀者分享如何用質樸的文字刻畫生命的堅韌與溫度。他特別談及自己對香港的特殊情感，形容這座城市讓他感到「特別放鬆和安心」。他透露，早年因家族中有許多親友定居香港，從小便透過他們接觸到香港的點滴。「小時候第一次喝到的可口可樂、收到的米奇老鼠T恤和文具，都是香港的親友帶回來的。」這些來自香港的禮物構成了他童年記憶的一部分，而許多兒時玩伴也移居香港，進一步加深了他與這座城市的連結。香港的美食或許也是他熱愛這座城市的原因之一。他笑說：「去年參加書展，我帶着母親和小孩在香港住了十幾天，到處尋找美食。我的胖和香港也有關係，香港要負責任！」

講座後的問答環節，一位廣東順德德勝學校的中學生專程遠道而來，他自稱小學六年級便讀完了《皮囊》，「《皮囊》在我們圈子裏很火，有些內心想法我們說不出來，但可以複製書中的文案發去朋友圈，這也是我們和家長交流的一種方式。如果以這樣的目的，您會推薦我繼續讀哪本書？」面對一位真誠的年輕讀者，蔡崇達的推薦顯得格外審慎。他建議對方嘗試閱讀《命運》，但隨即補充了一個重要的前提：「按照原來的讀法，有觸動就讀，沒有觸動就不用讀。沒觸動代表你內心還沒有敏感的那個點，你可以不用在意。」

講座後的問答環節，一位廣東順德德勝學校的中學生專程遠道而來，他自稱小學六年級便讀完了《皮囊》，「《皮囊》在我們圈子裏很火，有些內心想法我們說不出來，但可以複製書中的文案發去朋友圈，這也是我們和家長交流的一種方式。如果以這樣的目的，您會推薦我繼續讀哪本書？」面對一位真誠的年輕讀者，蔡崇達的推薦顯得格外審慎。他建議對方嘗試閱讀《命運》，但隨即補充了一個重要的前提：「按照原來的讀法，有觸動就讀，沒有觸動就不用讀。沒觸動代表你內心還沒有敏感的那個點，你可以不用在意。」



●蔡崇達回答遠道而來的學生讀者問題。

像以上這樣的講座情景，蔡崇達已經經歷了很多次。其實他是一個喜歡安靜，甚至「可以兩個月不出家門」的「I人」，外出交流對他而言是巨大的能量消耗。然而最近一年，他卻拖着不時腫痛、需要拐杖支撐的身體，奔波了幾十座城市。這一轉變，源於幾次刻骨銘心的相遇。

「作家得幹活了」

一次，他在小紅書看到一位父親的帖子。那位父親的女兒因抑鬱症長期自我封閉，卻在沉寂大半年後，第一次主動開口說要出門——去參加蔡崇達的分享會。父親默默跟在女兒身後，看着女兒仰頭聽講的背影，寫道：「這是這一兩年來，她安靜聽人說話最長的時間。我不知道哪句話最觸動她，但她可以為了來聽活動而主動走出來，重新回到人間，真的特別好。」另一次，在一所211大學，一個女孩站起來告訴他，自己高二時因學業困境陷入絕望，是朋友送的《命運》陪她度過了至暗時刻，最終考上了大學。蔡崇達正為之欣慰，女孩卻哭了：「為什麼送我書的那個人，他自己卻走了（離世）？」

「我當時眼眶就紅了。」蔡崇達回憶道。這些故事讓他生出一種「特別急迫的感覺」。「作家的角色其實是陪伴者，能走進讀者心中那些最難受、最無法自我表達的部分，文學本來就是因為人要關心人而發明的。」於是，他推掉了更能直接促進書籍銷售的直播邀約，堅持選擇與讀者面對面深度交流，更要求出版方壓縮自己講述的部分，留出大量時間提問。「直到今年下半年，因為要寫長篇，我才不再出去。但等寫完，我覺得我還得去。」

他將此視為作家的職責。「我在很多場合經常說一句話：作家得幹活了。」他強調，儘管緊跟飛速變化的時代和人心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正因如此，才更不能缺席。對他而言，一場成功的活動，指標不是賣了多少書，而是那一刻是否實現了「相互陪伴」，尤其是在那些難以言說的困惑與痛苦節點上的陪伴。這便是他走出書齋的意義。

用英文撰寫《中國文學史》 張隆溪：讓世界看清中國文學的「廬山真面目」



▲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原主席、湖南師範大學「瀟湘學者」講座教授張隆溪 資料圖片

▶張隆溪著《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資料圖片

在全球化與本土化思潮交織碰撞的今天，如何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才能超越「獵奇」與「他者」的標籤，實現真正平等的文明對話？近日，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原主席、湖南師範大學「瀟湘學者」講座教授張隆溪接受中新社專訪，分享中國文學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身份定位與對話可能。

張隆溪深愛中國文學及其傳統，一直在研究中西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中國文學歷史悠久，有許多文學價值極高的經典作品，和西方文學名著應該有同等的地位，但卻沒有充分得到中國以外眾多讀者的注意。」他留意到，在當今世界，英語是流通最廣泛的語言，故選擇用英語寫《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是針對我所了解的國外世界文學研究現狀而寫，它的

讀者對象是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國文學和歷史、對中國有興趣的外國讀者，我希望將李白、杜甫、蘇東坡變得像莎士比亞那樣，成為世界各國讀者都熟悉的大詩人、大作家。」

他坦言並不奢望通過一本書就能改變現狀，「這是一種努力，是一個中國人在世界文學研究的大框架之下，向國外讀者介紹中國文學的歷史和傳統。這也是一個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發出的聲音，如果有更多這樣的聲音，假以時日，就將在國際上產生一定的影響。」

破「他者」之障 融「內外」之見

在中國學研究領域，西方學者常習慣強調「他者」以突出文化差異。如何讓世界看清中國文學的「廬山真面目」？對此張隆溪回應道：「西方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文化傳統，往往強調差異，視之為西方的『他者』或對立面。相比之下，我認為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序裏提出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才是跨文化比較研

究的基本原則。因為跨文化研究最終希望能有助於人類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共同進步，主張和而不同，而不是強調差異，造成緊張和衝突，甚至戰爭。」

他認為，中西比較雖是學術研究，但這種研究並不是象牙塔裏的虛構，而是與世界直接相關，有助於促進世界的和平與共同發展。「我曾經用蘇東坡一首深具哲理的小詩說明如何認識中國，那就是《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很多人認為，最後兩句說的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道理，這就誤解了此詩的真意。如果蘇東坡真是說旁觀者清，那從外面看中國的漢學家們，應該比中國學者更了解中國。」

由此，他點明，認識中國，就像看廬山的全貌一樣，應該綜合不同視角所見的景象，不應有內外之分，遠近之別。「漢學家有外面的視角，中國學者有內在的了解，互相交流，共同努力，才會達到更符合實際的認識和理解。」

●中新社